

将复辟狂的丑态拿来示众

——试论《肥皂》和《高老夫子》的战斗意义

冯 天 瑜

鲁迅指出：“说到中国的改革，第一著自然是扫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五四运动，本也是这机运的开端罢，可惜来摧折它的很不少。”（《出了象牙之塔·后记》）这里揭示了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每当一场大革命过去之后，旧世界的卫道士们，便争相“摧折”这场革命所开创的“机运”，大搞“克己复礼”。

五四以后，那些老牌的和打上了洋奴印记的“国粹家”们，迫不及待地结成反动同盟，向新文化运动反攻倒算，为被打倒的“孔家店”翻案。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鲁迅，勇敢地站出来同这伙复辟狂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不仅在一系列投枪匕首似的杂文中，对“国粹家”作过深刻而精微的解剖；而且，他还运用小说这一艺术武器，刻画了孔孟之徒的可憎面目，向人们生动地展示了号称“国粹家”的复辟狂们的丑恶形象。如果革命人民要识别复辟派，要了解他们的反动本质及其卑劣伎俩，就请读一读鲁迅的讽刺杰作《肥皂》和《高老夫子》吧。

（一）与新生事物不共戴天，是复辟派阶级本能的必然表现。

《肥皂》中的四铭和《高老夫子》中的高干亭，其身世，小说都没有明确交待，但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可以看出，四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封建余孽，高干亭则是一个“打牌，看戏，喝酒，跟女人”，无所不为的高等流氓。然而，正是由这样的一帮丑类，组成了复辟派的基本队伍。他们尽管各有特色，但是，作为没落阶级的代表，他们都疯狂地反对新生事物，无限缅怀旧世界、旧文明。四铭一伙拟定的征文题目：“恭拟全国人民合同词吁请贵大总统特颁明令专重圣经崇祀孟母以挽颓风而存国粹文”，高干亭胡诌的文章《论中华国民皆有整理国史之义务》，都散发着强烈的尊孔复古臭气；并充分表明，他们是依附于反动统治者的帮闲或帮凶文人。

四铭对于一切新的事物和新的人物，从新学堂到新词汇，从新青年到新女性，无不怀着病态的仇恨。作为一个儒家教育的狂热卫道士，他特别起劲地漫骂教育界的新生事物。“没有实学，只会胡闹”，便是他对青年一代的总评语。

五四运动兴起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狂飙，唤醒了人民，青年再也不愿死啃“四书”“五经”的高头讲章，四铭们便说这是“没有实学”；青年冲破旧礼教的束缚，在解放的路

上迅跑，四铭们便污蔑这是“只会胡闹”。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和新事物的涌现，使得“‘子曰诗云’愈挤愈苦，愈看愈无用”（《热风·随感录四十八》），守旧的道学家全然成了青年取笑的对象。四铭在商店就被几个学生所嘲讽。回家后，他如疯似狂地催促儿子，查出学生骂他的那个“鬼子字”是什么意思，表现了他同新事物、新人物不共戴天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又集中到一点——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刻骨仇恨。他狂吠：“他们还嚷什么‘新文化新文化’，‘化’到这样了，还不够？”

四铭对新文化运动和教育改革的反动，彻底得很，连百日维新时代的“废科举，兴学堂”，他都认为错了，公然叫嚣：“什么学堂，造就了些什么？我简直说：应该统统关掉！”那个“高老夫子”在课堂上出尽丑态，因而受到学生的奚落后，也得出了与四铭相类似的结论：“学堂确也要闹坏风气，不如停闭的好，尤其是女学堂”。鲁迅以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特有的表现手法，把古往今来的复辟派砍杀新生事物、镇压新生力量的狰狞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给人以警觉。

（二）极端伪善，“口上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娼”，是复辟派的共通特征。

四铭一向是以维持纲常名教为己任的。见了剪短发的女学生，他也要咬牙切齿，义形于色地说什么，“我最恨的就是那些剪了头发的女学生，我简直说，军人土匪倒还情有可原，搅乱天下的就是她们，应该很严的办一办……。”那个“高老夫子”，也自封为“我辈正经人”，表示决不能同女学堂“酱在一起”。然而，这些满嘴“男女授受不亲”的道学家们，肚里想的是些什么呢？四铭在街上看到一个孤苦无告的青年女乞丐时，马上就起了卑污之心。然而，他毕竟是一位“正人君子”，深知那类念头是万万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中表现出来的。而一个围观的光棍则直率得多，叫道：“阿发，你不要看这货色脏。你只要去买两块肥皂来，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这话正中四铭的下怀，说出了他想说而又不便说出的话。事后，四铭对家里的人，以及他的那帮狐群狗党，一再复述这段下流话，显示了他所怀有的猥亵念头，决不亚于那个街头流氓，而其虚伪性，又远在流氓之上。

知其夫莫过其妻。四铭的老婆很敏锐地觉察到，丈夫对这种下流话如此感兴趣所包含的全部意义，并当场揭露他“不是骂十八九岁的女学生，就是称赞十八九岁的女讨饭：都不是什么好心思。‘咯支咯支’，简直是不要脸！”这番话揭得四铭顿时张口结舌，“油汗满面”。但是，这小小的打击，并未消除四铭浓厚的兴致。当“移风文社”的“文友”前来商议征文题目时，四铭又津津有味地谈起流氓侮辱女乞丐的卑污语言，“文友”们马上领略到其中的奥妙，心照不宣地狂笑不止。这帮在台前高唱“振兴道德”的“圣人之徒”，在台后卸下了伪装，其表演是何等污秽不堪呵！“现在的正人君子，他们骂女人奢侈，扳起面孔维持风化，而同时正在偷偷地欣赏着肉感的大腿文化。”（《华盖集·无花的蔷薇》）四铭们便是这类“正人君子”。

鲁迅说过：“向来，我总是不相信国粹家道德家之类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确有珠泪横流，也须检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什么保存国故，什么振兴道德，什么维持公理，……心里可真是这样想？一做戏，则前台的架子，总与在后台的面目不相同。”（《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肥皂》和《高老夫子》的杰出之处，正在于把复辟派“前台的架子”与“在后台的面目”作了绝妙的对照，使这帮假道学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这对人们识别至今仍在活动着的复辟狂的两面派嘴脸，是大有益处的。

(三) 拉大旗作虎皮，借助公理正义的美名、流言公论的武器，堂而皇之地向新事物大兴问罪之师，是复辟派的惯用伎俩。

复辟派是具有反革命经验的，他们向革命事业进攻，总是十分讲究策略。窃取“革命”、“进步”的头衔，盗用时髦动人的名义，借此骗人、吓人，以售其奸，是他们十分擅长的手法。那个狗屁不通的文化骗子高干亭，竟利用高尔基在中国人民中享有的盛誉，进行投机，宣布他“骤慕俄国文豪高尔基之为人，因改字尔础，以示景仰之意。”四铭在讨伐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则自封为老牌革新派，因此唯他最有资格说革新不行。他恬不知耻地说：“在光绪年间，我就是最提倡开学堂的，可万料不到学堂的流弊竟至于如此之大。”既然他也慨叹学堂“流弊太大”，可见学堂确实罪大恶极，非关闭不可了。他还说：“秀儿她们也不必进什么学堂了。‘女孩子，念什么书？’九公公先前这样说，反对女学的时候，我还攻击他呢；可是现在看起来，究竟是老年人的话对。”四铭在这里，不惜贬一贬自己的“过去”，以显示他是多么公允平正，并借此衬托他今日的观点，全然是“过来人”的真知灼见。

复辟派为了欺骗别人也为了欺骗自己，还喜欢作戏似地自我打扮成忧国忧民之士。四铭就煞有介事地叹息：“学生也没有道德，社会上也没有道德，再不想法子来挽救，中国这才真个要亡了。”啊呀呀，四铭先生的崇论宏议真令人钦佩之至！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统治者的出卖，都不是“中国将亡”的原因，唯有旧道德的崩溃，便要弄得“国将不国”了。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的奇妙逻辑。把导致“亡国”的罪责推到革命身上，以此算革命运动的账，翻革命运动的案，这正是那些反对革命、破坏革命，甘当洋奴、儿皇帝的反动派，所惯用的倒打一耙的卑劣手法。

(四) 抓住文教阵地不放，是复辟派的又一共通特征。

没落阶级要搞复古倒退，向来注重制造舆论，因而古往今来的复辟派都抓住思想文教阵地不放。四铭就伙同一帮反动文人，拼凑了一个“移风文社”，并勾结反动报纸，鼓吹“整理国故”、“保存国粹”，狂热地反对新生事物。那个流氓高干亭，也破门而出，侈谈“整理国史之义务”，参加了复古倒退的反革命大合唱。

这些复辟狂还尤其重视教育。四铭就以一副“严父”的姿态，大施“家教”，拼命向子女灌输孔孟之道，尤其是用“孝”来规范他们的思想行动，千方百计把他们培养成封建阶级的驯服工具。他给儿子规定的“庭训”，是每日练习充满封建色彩的“八卦拳”。他对子女动辄训斥，小不如意，便怒目横视，充分显示了孔孟卫道士的冷酷、凶残和专横。而四铭的“晚餐教子”，则可以说是中国封建家庭教育的一个缩影。

在这次“热闹的晚餐”中，首先是小女儿带翻了饭碗，四铭便大瞪了细眼，直到孩子吓哭，这才收回眼光。而当他“早先看中了的一个菜心”被儿子夹去时，就借故大发雷霆，骂儿子“也没有学问，也不懂道理，单知道吃！学学那个孝女罢，做了乞丐，还是一味孝顺祖母，自己情愿饿肚子。”这个关于“菜心”的细节描写，就把“孝道”提倡者行私利己的丑恶本质，淋漓尽致地揭示出来。

如果说《肥皂》极为精彩地展现了一幅旧中国家庭教育的风俗画，那么，《高老夫子》则入木三分地批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的腐朽性。

高干亭明明是一个不学无术的文化骗子，而万恶的旧社会却给这种人送上种种漂亮的牌号，贤良女校也忙不迭地“再三敦请”“高老夫子”去担任历史教员。请看，贤良女校的教务长万瑶圃是怎样向学生介绍高干亭的：“这位就是高老师，高老师，是有名的学者，那一篇有名的《论中华国民皆有整理国史之义务》，是谁都知道的。”“斯人之出，诚吾中华文坛之幸也！”可见，在反动派那里，“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谎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十四年的“读经”》）万“教务长”把一个只会嫖赌逍遥的无赖吹捧成“有名的学者”，就是明证。这岂不是在蓄意欺骗青年，将一块发臭的烂肉用红纸包扎起来，推销给学生吗！作品通过对高干亭和那个别号“玉皇香案吏”的万瑶圃的描写，深刻谴责了旧学校的肮脏和虚伪。这帮人一方面攻击妇女解放，胡说女学“淆乱两仪，非天曹所喜”；另一方面又要“顺应世界的潮流”，办点女学装饰门面。他们一再强调，女学必须“办理得人，不偏不倚，合乎中庸，一以国粹为归宿，那是决无流弊的”。所以万瑶圃得意地夸耀，在他“治下”的女学，“学生是很驯良的，她们除听讲之外，就专心缝纫……。”总之，这样的“女学”培养的是典型的后补“贤妻良母”。所以，作品的锋芒所指，决不只是高、万这类光怪陆离的“国粹家”，而且沉重打击了整个腐败的旧教育制度。

毛主席指出：“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鲁迅向来是重视反面教员的，他总是把这些家伙的种种行径记录下来，公诸于世。因为他深知：“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将来的战斗的青年，倘在类似的境遇中，能偶然看见这记录，我想是必能开颜一笑，更明白所谓敌人者是怎样的东西的。”（《伪自由书·后记》）今天，当我们同那些窃取“革命”、“马列”的名义，却干着复辟倒退勾当的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时，看看《肥皂》和《高老夫子》这类作品，确实也会“开颜一笑”。我们面前的敌人，从刘少奇、林彪到邓小平，不正是这样的“东西”吗！邓小平反对新生事物，同四铭、高干亭叫嚷“关闭学堂”何其相似；邓小平做出一副忧民的姿态，并打扮成“老革命”的模样来反对文化大革命，又同四铭、高干亭的老谱多么维妙维肖；邓小平那样死命地抓教育，也正与四铭、高干亭一样，企图以教育阵地作为夺人心、搞复辟的桥头堡。鲁迅的这两篇作品的战斗意义，正在于总结了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揭示了复辟派活动的规律。它们象照妖镜，照出了复辟狂丑恶的原形。

《肥皂》和《高老夫子》的战斗意义还表现在，它们雄辩地证明了那些倒行逆施的复辟狂是多么孤立、虚弱。四铭、高干亭之流表面上气势汹汹，威严得很，其实，他们却色厉内荏，不堪一击。高干亭装腔作势，竭力遮掩丑态，但在讲台上被女学生们“吃吃地窃笑”，就连一堂课也混不下去，仓皇逃走，以至一头碰到桑树上。四铭虽然道貌岸然，但因为心怀鬼胎，所以老婆的三言两语就揭得他狼狈万分，无地自容。可见，人一背了理，就怕揭露。这正如鲁迅在一篇杂文中所指出的：“凡是倒掉的，决不是因为骂，却只为揭穿了假面。揭穿了假面，就是指出了实际来，这不能混谓之骂。”（《且介亭杂文二集·“招贴即扯”》）四铭、高干亭之流尽干坏事，因而极端孤立，他们除了能够在自己的那一帮狐群狗党中找到“知音”外，没有人支持他们。不是连四铭的小女儿也在背后骂他“不要脸”么。鲁迅在这两篇小说中，何等有力地揭示了历史的无情的辩证法——倒退没有出路，翻案不得人心！